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学校教育

雷聪 张静 彭陟焱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关键词] 国民政府时期; 川西北土司地区; 学校教育

[摘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为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治理、实现对边远地区的开发, 在边远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兴学运动, 因此学校教育在汉族、藏族、羌族、回族等聚居的川西北土司地区得到发展。这一地区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四种类型, 其学校教育在当地的发展各具特点, 使得近代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各民族逐步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促进了这一地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 G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22)03-0071-09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川西北土司地区虽已实行改土归流, 但是土司制度仍然存在于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 并且对当地藏、羌群众的生活与社会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为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治理, 改善土司地区落后的社会状况,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导下, 川西北土司地区设立各类学校, 以期通过发展学校教育实现对该地区的开发, 从而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

一、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基础

川西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 高原、山原、高山峡谷相间分布, 具有多样的生态环境。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 各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在高原、山

原与峡谷之中, 形成了以汉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区, 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 元、明、清三朝在该地区推行土司制度, 并制定了“尊孔崇儒、兴学设教”的文教政策。明朝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 教化以学校为本”^[1]的政策, 洪武二十八年(1395), 明廷诏谕礼部曰:“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 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 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 而无悖礼争斗之事, 亦安边之道也。”^[2]清承明制, 确立了“兴文教, 崇经术, 以开太平”^[3]的政策, 亦在土司地区广设官学, 如“茂州学……本朝顺治十六年重建, 康熙六年修, 乾隆十年、四十年重修, 汶川学……本朝乾隆六十年修, 嘉庆五年重修, 入学额数六名旧额八名, 乾隆六十年减二名, 石纽书院在汶川县……本朝乾隆二十八年建。”^[4]

[收稿日期] 2022-05-21

[作者简介] 雷聪(1997—), 陕西商州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 张静(1996—), 女, 满族, 河北承德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 彭陟焱(1968—), 女, 羌族, 四川茂县人, 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扭转清王朝羸弱的局势,晚清政府实施“新政”。在“新政”教育改革中,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废除科举、广兴新式学堂。全国范围内出现办学热潮。《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后,川西北地区所辖各州、县,均先后在书院、义学的基础上创设新式学校,《松潘县志》载:“高等小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朝议变法,停科举,设学堂,同知黄汝楫就岷山书院旧址并入张公祠地改建。学堂规模扩大,校室完美,拟立中学,而松属偏僻,中学不宜,仍立为高等小学校,附设师范传习所。民国33年(1934),并为高、初等小学校。”^{[5]1965}这种举措为川西北土司地区近代学校教育的创办打下了基础。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的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项边疆教育政策的颁行、实施,为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其主要体现在教育政策的出台、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学校的建立和师资力量的保障等方面。

(一) 出台教育政策,设立教育行政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于1937年颁布《教育部廿六年度推行边疆教育计划大纲》^{[6]895-906},对边远地区的师范教育、小学教育、社会教育、生产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作出明确要求,并对教育教学内容、教育经费分配以及筹办边疆教育的注意事项作出详细说明。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以推进边远地区的教育,如1939年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40年的《边远区域劝学暂行办法》、1941年的《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1944年的《边疆学生待遇办法》、1945年的《边疆初等教育设施办法》等。这些政策法规的颁布,对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在办学理念、学校发展、经费分配、生源保障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四川省政府于1939年9月20日设立边民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包括阿坝地区在内的学校教育,同时拟定了《边疆教育实施要项》与《边疆教育应注意社会教育办法》,以加强对土司地区教育的组织管理。1941年6月,四川省政府颁布了《四川省边民教育改进计划》,对省内少数民族教育的实施原则作了归纳,涵盖教育方法、学校系统、师资训练、教材编印、经费筹措等方面的内容。

1939年,《四川省政府教育厅二十八年年报》^{[5]2065}总结了县教育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为严密视导组织,各学区教育委员一律裁撤,组织视导网”^{[5]2065},要求各县设立教育视导处,设置教育视导主任1人,督学若干人。此后,1947年,四川省又颁布《县市教育局组织规程》《四川省各县市教育局办事细则》^{[5]2065}等文件,要求各市县按照实际情况,把原有教科改设教育局,这些举措解决了此前教育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加强了基层政府对学校教育的管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四川省相关教育政策的颁布,以及四川省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为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与制度上的保障。

(二) 推动学校建设,引导学生入学

1936年,四川省政府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推进蒙藏回苗教育计划》要求,制定了《边民教育实施办法》,在全省15个边远民族聚居地区,开设省立边民小学,并派驻工作人员督促检查省内少数民族小学的设置,省立省内少数民族学校相继建立。此外,对于边远地区兴办学堂有功的地方官也给予奖励,如“设立单级小学或民众学校一班,自筹经费每年达六百元以上者,授予五等奖状;设立小学或民众学校四学级,自筹经费每年达二千四百元以上者,授予四等奖状;……设立小学或民众学校达五十学级,自筹经费每年达三万元者,除授予一等奖状及题给匾额外,并由教育部明令嘉奖;设立小学或民众学校达五十学级,并办有中等以上学校、自筹经费每年达五

万元以上者,除授予一等奖状及题给匾额外,并由教育部呈请国民政府明令嘉奖。”^{[6]96-98}这些举措使基层政府对边远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能够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有效推动学校教育在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发展。

为了保证学生能够积极入学,1940年颁布的《边远区域劝学暂行办法》指出:“每年劝导学生三十人以上入学者,授予铜质奖章;每年劝导学生六十人以上入学者,授予银质奖章……每年劝导学生三百人以上入学,并劝募经费达六千元以上者,授予一等奖状;成绩特别优良或连得一等奖状二次以上者,题给匾额;各机关职员受有五等以上奖状者,得由各该机关酌量予以论功加俸或晋级。”^{[6]96-98}南京国民政府把劝勉边远地区学生入学纳入地方官员晋升评判标准之一,足见当局对边远地区教育的重视。川西北当地政府也根据土司地区的特殊性,出台了具有强制性的规定,即“凡应入学而不入学者,对其家长或保护人予以一定限期必须就学之书面劝告,其不受劝告者,布榜警告,仍不遵循者,由县政府处以罚款,成人罚以一定期限劳役,并仍责令入学。”^{[5]1986}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从政府与个人两个层面出发,保证了川西北土司地区部分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提高这一地区适龄儿童的受教育程度,保障了学校的生源,推动了当地学校的设立。

(三)提高教师待遇,保证师资力量

川西北土司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且生活艰苦,为缓解这一地区学校教育师资力量不足的状况,当局提出对在边远土司地区任教的教师,给予相应的奖励。1941年四川省教育厅改订省立边民小学经费支付的标准,规定:“合格校长月支八十元,专任教员月支六十元。又于本年依照四川省政府人员待遇标准,给予同样之生活津贴,即:五十元以下者,月给生活补助费六十元;五十元以上百元以下者,月支五十五元;百元以上者,月支五十元。1941年6月又批准增加靖化教师生活补助费,每人月支八十

元,12月校长及专任教员月各增支十元,对于由内地去的教师,根据路程远近发给旅费。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是按年逐步提高,以期达到三倍衣食住之标准。”^[7]这项政策的实行,提升了这一地区教师从业者的待遇,对于学校而言,则有望聘任能力较强的教师,保证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

南京国民政府和川西北地方政府为推动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资金、师资等方面的支持,使政府、社会、家庭都能够参与到本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之中,推动这一地区学校教育的转型和发展,为此后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借鉴、参考。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 学校教育的类型

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类型主要分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四个方面。

(一)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也称为幼稚园教育,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幼稚园教育始建于1943年。办学形式分为两种,即单独设立的幼稚园和附属幼稚园。茂县于“民国37年(1948)5月1日县城开办幼稚园,设凤仪镇鼓楼街(今禹乡街军区园艺场处)”^{[8]557};“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在营盘街(理县)办了一所幼稚园”^{[9]625};1943年“汶川县于县政府驻地绵虬镇中心学校设置幼稚班,规模渐有扩大,改设为县立幼稚园”^{[5]1961},后由于经费不足,于1947年停办;1947年,“威州乡村师范学校创设幼稚园”^{[10]629};松潘县于“民国34年(1945),在县城中心小学校长马须平报请县政府的批准后,在中心小学设立一个幼稚园”^{[11]669}。此外,理县还在薛城也创办了2所幼稚园。

幼儿教育在具体教学内容方面,政府未作出统一筹划,故无固定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自选自编,主要开设语言、计数、儿歌、故事、识字、节拍、舞蹈、游戏、剪纸、折纸、积木、泥工、画工等课程。由于川

西北地区地域广袤且幼稚园数量较少,幼稚园办学多以附属形式为主,故而这一地区幼稚园教育起步较晚,且多集中开设于茂、汶、理、松潘四地,其他地处偏僻的县区并未设立幼稚园。

(二) 小学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小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两种:公立小学和私立小学,其中公立小学又可细分为省立小学和县立小学,私立小学多由教会和私人开办。

公立小学包括省立边民小学和县立边民小学。1932年,在杂谷脑(理番县)设立第一边民学校;在沙坝(茂县)设立第三边民学校;在杂谷脑营盘街武庙创办省立理番边民小学;1936年,为培养边区人才,经国民政府当局批准,拨款银元619元,在松潘县城公园设立四川省立松潘小学,1941年停办。“到1945年,阿坝地区建立了8所县立边民小学,理番县和松潘县各有4所。”^[12]公立小学教育归属南京国民教育序列,其课程具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统一性,主要开设“修身、读经、讲经、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等课程”^{[9]636},而少数民族小学则开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8]573}等课程。

私立小学早于公立小学出现。1925年姚宝珊在漩口场广东街云峰书院旧址创办汶川私立广益学校,学校建立后招收“新生60余人,设3班,教师5人,其后设6个年级,学生90余人,教师12人。”^{[10]631}1933年姚氏去世,因经费问题学校停办。茂县县城外状元桥街清真寺内设有回民自办经学堂,1936年回民集资“添置设备将清真寺经学堂改为清真小学,有初小两班,学生30余人,多为回民子弟”^{[8]561}。阿甫黄明之兼校长,民国政府不予经费,列为私立小学,且教职员均义务教学。1936年10月,松潘县国民政府为实现“着夷民导入现代国民之途径”,拟订计划开办夷民小学校^{[11]671},大姓土司荣德清在云昌寺内建立云昌寺番民小学校;大寨土司乔登保,在大

寨的上尼巴寺内建立上尼巴番民小学校,但不久均停办。此外,私立小学还包括教会创办的小学,如“天主教会创办的小学有感功县公信小学、懋功县女子小学、崇化屯教会学校、绥靖屯教会学校;基督教创办的小学有汶川县萝卜寨小学、理番县佳山寨小学、立力寨小学、日尔觉小学、胆扎木沟小学、朴头小学;伊斯兰教创办的小学有懋功回民学堂、懋功回民小学、松潘清真小学、松潘伊斯兰教专科学校、靖化县私立中阿小学、茂县清真小学。”^{[5]1968}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学校法》的颁布,到民国34年(1945)，“十六区^①学校达270所,在校学生10698人,其中男生8540人,女生2158人;教职员554人,其中男491人,女63人。”^{[5]1968}

(三) 中学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中学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以周边几县联合集资办学为主,相较于同时期的小学教育,受制于经费、师资等方面因素,中学教育发展缓慢且学校数量较少。这一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的中学主要有“共立中学”“联立中学”“促浸中学”“杂谷脑初级中学”“理县初级中学”五所中学,其中影响较大的中学是“共立中学”和“联立中学”。

“共立中学”即1931年川西北土司地区设立的第一所中学——松理茂汶共立中学,校址在茂县夏公祠,同年6月,四川茂、汶、理、懋、松殖督办署召开各县屯军政官长、机关法团代表参加的行政会议,研究地方社会改革、社会治理问题,决定于该地区创办2所初级中学。办学经费方面,“屯署每年拨给每校3000元(每校每年额定1万元)”^{[5]1982},其余部分由各县筹集,由于懋、抚、绥、崇筹集资金不足,学校尚未办成。此后,松、茂、汶、理四县,“松潘2000元,理番1200元,汶川800元,茂县3000元。”^{[8]563}

① 十六区: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全川划置18个行政督察区,每区设专员公署,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十六区即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下辖茂县、松潘、汶川、理番、懋功、靖化六县。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松理茂汶“共中”成立,茂县县长张雪岩出任校长,“共中”招收两类教学班:普通初中和农牧专业,普通初中按部颁章程办理,以求进一步深造;农牧专业则按照《职业学校规程》进行办理,另加授藏文和藏传佛教教义,培养人才以供边地任用。四川省第十六区专署在经过松、理、汶三县同意后在茂县开办了茂松理汶四县县立初级中学,茂松理汶县立初中即茂县中学前身,其校址位于茂县龙王庙,顺公著为首任校长,由当时四川省政府委任,教师则多聘自于成都。“联立中学”于“民国30年春开办,学生由专署电令各县县政府考送。”^{[8]564}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生源与资金方面的问题,最后由茂县单独设立,并改称“茂县县立初中”。后于“民国38年(1949),茂县县立初级中学始设高中班,至1950年2月为人民政府接办,即今茂县中学。”^{[5]1982}

在中学教育中,主要开设公民、国文、英语、物理、数学、地理、历史、动物、植物、化学、生理卫生、图画、音乐、劳作、体育、童子军训练等课程,但由于师资和教学设备的缺乏,部分课程暂不开展。除主干课程外,还进行相关的思想道德和体育教育。因“茂县创办初中,时值抗日战争,学校除在‘公民’课中讲授‘三民主义’,还讲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思想,宣传抗日救国,动员募捐以支援前方将士”^{[8]564},思想道德教育明显受到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体育课以教国术为主,进行球类、游戏等体育项目和童子军训练,课余开展早操、篮球、排球、田径比赛。”^{[8]581}更有老师组织学生到永定山、老人山等地开展野营等活动。

1943年金川“县政府秘书萧湘雨等创办促浸中学,当年招收高小毕业生8人,借用城厢中心国民学校教室上课,由义办人员任教”^{[13]815},后因萧湘雨等人调任离开金川县,学校于1944年停办。1948年理县县长汪焕昌根据群众要求筹办县中学,“杂谷脑初级中学”位于薛城南沟川主庙。同年8月,“理县第一所初级中学正式诞生,曹建初担任校

长”^{[9]632}。在理县初级中学设立后,“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课程设置”^{[9]637},但在实施过程中,因师资不足和经费缺乏等因素,造成很多课程形同虚设,不能顺利开展,两年后(1950年)停办。

(四) 职业教育

国民政府时期为进一步开发川西北土司地区,在这一地区兴办职业教育,但其发展缓慢且多曲折。职业教育的发展主要以师范教育和卫生医药教育为主,整个民国时期在这一地区先后设立5所职业教育学校,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国民政府时期创办的四川省立威州乡村师范学校和国立松潘初级职业学校。

职业教育肇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于松潘岷山书院设置高等小学,堂内附设师范传习所,主要为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民国17年(1928),松潘建立松潘县立师范传习所”^{[11]676};“民国19年(1930)秋,屯殖督办署联合松、理、懋、茂、汶五县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在县城南郊夏公祠开办一年制师范,培养小学教师”^{[13]834},1931年学校停办;同期创办的懋功初级师范学校,在四川省政府拨款支持下于营盘街头建立,后由于经费不足于1933年停办。这些以培养小学教师为目的的师范传习所与初级师范学校,缓解了当时土司地区小学教员不足的现状。

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川西北地区逐渐成为全面抗战的大后方。为了进一步开发川西北土司地区,1938年秋在松潘设立国立松潘边区职业学校,隶属教育部蒙藏教育司。“该校是8所国立边疆职业学校之一,其办学宗旨是‘拓边建国,开发西北’,教育对象是‘汉、番青年’。学校设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的‘边疆党部’,蒋介石曾兼任该校校长,历任的七届校长都是国民党党员”^{[5]1986}。足见南京国民政府对这所学校的重视程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松潘城内租房设立的十六区第一所专业学校——松茂边区职业学校”^{[5]1986},傅成庸任校长,共有25名教职工,招收外地、本地具有

初中文化水平或同等学历学生。该校主要开设畜牧兽医科、医士科、初习班等专业,课程设置上主要分为三个类型,即普通课、专业课和党义课。普通课即国语、英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三角、历史、地理、藏语、军训等,专业课有药理学、诊断学、细菌学、畜牧管理学、土壤学、饲养学、病理学、解剖学等。由于该校隶属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学校经费充足,受学校管理者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等行为的影响,学校校产化为乌有,于1949年11月停办,但从该校的办学规模与开设专业来看,其职业属性较为明显。

为了适应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国民政府于1935年开始在十六区筹设乡村师范学校。1936年,四川省政府令“十六区署核定开办费1万元,择公地建校。”^{[5]1987}1938年,由省教育厅提供办学经费,任命冯克书为筹备主任,于1940年在汶川县3座古庙废墟上设立四川省立威州乡村师范学校。学校隶属四川省政府,“以陶行知的‘手脑心并用,教学做合一’为办学主旨”^{[5]1987},并于同年秋季开始招生,分设中师、简师二部,“开办时,有学生124人,教职工19人。”^{[10]650}除了本地区的学生外,还招收邛崃、灌县、崇庆县的部分学生,教师主要为东北流亡进川的大学本、专科生。截至1949年,共办简师14班,中师9班,毕业学生349人,毕业学生大多数回归原籍从事小学教育事业,推动了当地学校教育的发展。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特点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学校教育,对于这一地区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其存在的不足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特点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参与办学的主体多,学校形式多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的办学主体,除去各级国民政府在川西北地区创办的学校外,还存在个体办学(如土司、个人等)、教会办学(天主教、

伊斯兰教等)。办学形式多样,表现在红军办学和女子学校的创办,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此地创办的学校,如红军驻留绥靖、崇化时期,创办了列宁小学、番语学校——格勒(嘉绒小学),教员在红军战士中选拔,使用自编教材,但这两所学校在红军北上后停办;除了小学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松岗地区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该校奉命北上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合并。除此之外,女子教育在当地有所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除普通学校招收的女生外,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专门开设女子学校。1931年创办懋功县女子小学,1932年创办松潘县南坪镇女子小学,1938年创办理番县女子小学。在整个民国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前后创设9所女子学校,女子学校的广泛设立表明该地区女子教育受到重视,且女性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但因为办学主体较多,办学形式化,也间接导致办学质量在各种条件的限制下参差不齐,如私人办学多因经费、师资不足等原因导致学校停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一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

第二,以培养中华民族意识为目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危亡时期,也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社会的转型阶段,各个领域都迎来了变化。在教育方面呈现出向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转型的趋势。同期,兴办教育的指导思想即是培养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近代新国民,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便遵循这一思想,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这四个阶段所开设的课程来看国文、公民、历史旨在通过语言与历史增强民族间的交流和国族意识;在日常教学过程所贯穿的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5]1968}等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有意在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形成近代的民族观、国家观,塑造新国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促使这一地区的学生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

第三,教学内容实用性强且时代性突出。由于川西北土司地区汉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多民族聚

居,双语教学成为该地区的一种教学模式。在各级政府设立的学校中,要求学生学习国文的同时还要学习藏文;而天主教会、伊斯兰教设立的学校,除了学习国文外,还要学习英语或伊斯兰经文。这种双语教学的模式,立足于当地实际情况,呈现出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实用性强的特点不仅存在于语言教育方面,还体现在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之中,“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事国民教育、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和健全人格的培养”^{[5]2020};在课堂中教师带领学生见识近代科技,“国职校修建理化室70平方米,有理化仪器一百多件,动物标本七十余件,英国进口1000倍显微镜1台”^{[11]688},这些仪器增加了土司地区学生对近代科技的了解,也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课程方面,幼儿教育阶段各个幼稚园的课程和教学标准的根本目标,即为增进儿童身心健康,培养人生基本的优良习惯;小学教育方面,其教育内容主要在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身体素质、观察能力与动手能力;在中学教育时期,增设生理卫生、英语、思想教育,前两门课程符合学生个体的发展需要,而思想教育则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时代性;职业教育上则符合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增加了川西北土司地区民众对近代知识的了解,为这一地区现代畜牧业、现代医学、现代教育的发展储备了人才,奠定了基础,加速当地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学校教育中的课程、思想能够让学生在日积月累的比较中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对旧有的、落后的思想、观念产生转变,这无论对于培养新国民还是增加土司地区民众的国族认同,均会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学校教育经费短缺。从前文不难看出,经费是制约川西北土司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部分学校的倒闭或师资力量不足,往往因资金缺乏而导致。由于川西北土司地区高原、山地广布,环境较为闭塞,当时社会发展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形见绌,无力支持社会公共福利事业

的创办、发展,从而限制了该地区学校教育经费的投入。此外“民国时期,教育资产及经费管理紊乱,各级政府拖欠、侵占、挪用、滥支教育经费现象盛行”^[14],以致教育经费短缺,这也是学校不能够正常运转而倒闭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存在部分“替学”“弃学”现象。前文中出现的劝学政策足以说明,川西北土司地区部分“戎民贵族”的子弟认为不必读书。为了应付公事,“胡乱派送他们小娃子及奴仆的儿子来校读书。也有奴仆儿子不愿意读书的,他们只出钱请汉人的儿子,冒充戎人,报名入校。”^{[15]181}在督办署的严厉取缔下,冒名顶替入学还是不能避免。此外,“汉民和羌民多知道中文的重要,而戎民则迷信着佛教的经典,他们的脑筋始终不肯接受中文。他们的儿子到了入学的年龄,多送往喇嘛寺里,教他们读经文。”^{[15]59}且“羌民戎民多不喜读书。他们以为读了书不去做官,读书还有何用?”^{[15]29}可见当时,由于土司贵族稳定的社会地位与宗教因素的影响,以致出现入学读书无用论,出现大量“替学”“弃学”的现象,也是导致国民政府制定劝学政策的主要原因所在。

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教育在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发展,对于当地社会而言,主要产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促进当地学校教育的发展

“国民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种划时代的开发”^[16],川西北土司地区教育的发展更是如此。在各级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川西北土司地区积极响应并落实各项教育政策,例如在师资方面,“校长、教师符合规定资历”^{[5]2001}方可任教;在资金方面,“办学经费由中央补助及本省自筹的边民教育经费分期拨发”^{[5]2001},供学校教育在当地的发展;在学校的数量上,以茂县的小学教育为例,“民国25年

(1936)春,全县共有小学20所,到民国37年(1948)全县有中心国民学校8所,保国民小学50所”^{[8]559}。可见在人力、物力等条件紧缺的情况下,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学校教育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相较于之前“屯区教育极不发达”^[17]的状况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已经取得较大突破,为这一地区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加速当地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推动当地民众的国族认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为当地社会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加速了当地社会的近代化。以职业教育为例,威州乡村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接受现代师范教育后主要从事教育事业,普遍分散于土司地区的各个小学。首先,他们的返乡任教为当地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师资;其次,返乡任教的教师群体充当了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媒介,给当地社会带去了全新的思想、文化,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当地社会的生产生活,间接刺激了当地社会的进步。而国立松潘边区职业学校,则为当地社会培养了大量的近代技术人才,直接向当地社会输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理念,加快了当地社会发展的步伐。

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给川西北土司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去了自由、平等、开放的思想文化,逐渐唤醒了民众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在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学校教育中不难看出,自小学开始在主干课程的教学中,均包括国语、历史以及具有政治意味的公民课,这些课程的设置符合当时培养近代新国民的要求。同时对于川西北土司地区的广大民众而言,学校教育的发展使得各族民众逐渐形成近代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与国族认同。

(三)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学校教育在川西北土司地区的推行,促进了这一地区汉族、藏族、羌族、回族等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学校为纽带发挥教育的功能,通过课

堂学习密切了各族学生的联系,增加了民族之间的互动。此外,各类学校的建立也推动了川西北土司地区社会习俗的转变,直接表现在各族民众对国文的学习运用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社会习俗的转变则源于对新事物的接受而渐进发展,这一地区各族民众从了解学校教育进而接受学校教育,就是对现代工业文化的认可。在学校学习过程中所采取的双语教学模式,即“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5]2005},则改变了“戎民学生初入校时,咬汉音很是困难”^{[15]181}的现象,对汉语的掌握使得民族间的互动更加顺畅;而在学校教育中设置的大多数课程,均以“孝悌、忠信、亲爱、义勇、崇敬、勤俭和清洁”^{[5]2020}等为准则,既包涵了儒家的思想精髓,又涉及到个人的生活习惯,这些准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土司地区各族学生的观念与生活习惯。而各族学生又是当地社会的建设者与现代文化的传播者,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均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当地各族民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他们的国族认同,“以激发对社会、国家之责和进取之志气,养成爱国爱群之精神”^{[5]2020}。

总之,在以培养新国民为目标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土司地区开展的兴学运动,使当地逐步建立起了近代学校体系,推动了当地学校教育的发展。为这一地区培养的近代教育人才、医学人才和畜牧人才,促进了对川西北地区的开发,加速了当地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提升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素质,使得当地民众生活习惯得以转变,密切了当地汉、藏、羌、回等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此基础上让川西北地区的各个族群逐步形成了近代的国族认同。在川西北土司地区学校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经费不足、贪污腐化严重等问题依旧值得我们关注。但仍需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西北地区的学校教育,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地区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686.
- [2] 杨士奇. 明太祖实录[Z].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3476.
- [3] 嵇璜, 等. 清文献通考: 卷 69[Z]. 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出版日期不详]: 1087.
- [4] 佚名. 大清一统志: 卷 415[Z]. 影印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 [出版日期不详]: 8245.
- [5]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阿坝州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4.
-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 辑[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7] 郭有守. 四川省边地教育实施[J]. 四川省国民教育指导月刊, 1941(12).
- [8]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茂汶羌族自治县志[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7.
- [9]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志编纂委员会. 理县志[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
- [10]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汶川县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 [11]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志编纂委员会. 松潘县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 [12] 马廷中, 王菊. 民国时期四川阿坝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J]. 贵州民族研究, 2012(6).
- [13]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金川县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4.
- [14] 高耀丽. 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短缺的原因、对策及其启示[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3).
- [15] 庄学本. 羌戎考察记[M]. 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馆公司, 1936.
- [16] 陈淑真. 国民教育之涵义及其特质[J]. 贵州教育, 1941(1).
- [17] 邓锡侯. 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Z]. 1936 年打印本, 1936: 113.

The Education in Tusi – system Area in Northwest Sichuan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Lei Cong, Zhang Jing, Peng Zhiyan

(School of management,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China)

Keyword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Tusi – system Area in Northwest Sichuan; School Education

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gover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remote regio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actions to flourish the education. As a result, the school education rapidly developed in northwest Sichuan where adopted the Tusi government system and Han, Tibet, Qiang and Hui people lived together. The school education there could divide into four types such as elementary level, primary level, middle and secondary leve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here developed with unique features, which contributed to form the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is area and increas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eventu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society.

[责任编辑: 王 雷]

[责任校对: 张 阳]